

論波蘭民主化的發展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產黨組員召集人）

一、前言

自今（一九八九）年二月，波蘭朝野展開為期八週的圓桌會議以來，波蘭政治情勢的發展起了極大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者：

首先，「團結工會」（Solidarność）重新取得合法地位，並於六月大選中，大獲全勝：在參議院一百席中贏得九十九席，在眾議院第一回合中贏得一百六十席。相反地，執政的波共（本名為「統一工人黨」PZPR）大失民心，在第一回合只出線五席，其餘名額均在第二回合的選舉中始告上榜。①這種情勢的發展，打破波共戰後一直保持「一黨專政」的局面。

其次，波共在國會失去優勢後，總統的選舉首度出現進退兩難的窘境。原波共領導人兼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因未獲「團結工會」議員的支持，在無把握獲得足夠當選票數的情況下，知難而退，宣佈放棄角逐，改推薦前內務部長季斯札克（Czesław Kiszczak）。惟季氏有鎮壓「團結工會」的不良記錄，也得不到「團結工會」議員的支持，波共領導階層考慮再三，還是認為雅魯澤爾斯基是最適當人選，雅氏只好孤注一擲，披掛上陣。於是，在總統人選的猶豫和選舉日期的展延兩難情況下，雅魯澤爾斯基終於以二百七十票，僅比出席議員半數二六九票，一票之多而告當選。②這種演變也說明了波共壟斷權力的局面，已告落幕，波共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了。

其次，波蘭組織新內閣失敗，「團結工會」取而代之，獲得執政機會。原本是波共傳統上的聯盟——統一農民黨（ZSL）和民主黨（SD），臨陣倒戈，轉而支持「團結工會」，使得「團結工會」始料未及的提早嚐到權力的滋味。由「團結工會」推薦的馬佐維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獲總統提名，並經議會壓倒性多數的同意。馬氏終於組成共黨世界有

註①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十日，第九版。

註②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第十版。

史以來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舉世矚目。這種歷史的轉折，也顯示東歐共黨政權在民主化的進程，有了重大的突破，共產黨「牢不可破」的勢力正在瓦解之中。

波蘭何以會有這麼大幅度的變革？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共政權頒佈軍管法，鎮壓了「團結工會」的民主化運動。七年之後，華沙當局改變初衷，轉而與「團結工會」展開對話，隨後達成協議，改造行將四十年的政治結構，而創造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新的篇章。到底是那些因素推動了波蘭民主化的進展？波蘭的民主化進程有何特徵，其所顯示的意義為何？以及現階段波蘭「非共」政府所面臨的課題和前景如何？本文主旨擬就上列問題進行客觀的解析。

二、波蘭政治改革的背景

波蘭是東歐八個國家中，無論面積（三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平方公里）或人口（三千七百三十四萬），均居首位，是華沙公約集團最重要的成員之一。由於波蘭在歷史上處於日耳曼和俄羅斯兩大民族之間，曾於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度遭到瓜分，史家乃有「悲劇的波蘭」之謂。戰後，波蘭被赤化，四十餘年來，也同樣過著不平靜的日子，幾乎不到十年總有一次大大小小的動盪局面。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茲南（Poznań）爆發大規模罷工事件，引起政治危機，迫使波共領導階層改組，富有波蘭民族主義色彩的戈慕卡（Władysław Gomułka）上臺。一九六六年，波蘭天主教會慶祝基督福音傳入波蘭一千年之際，學生和知識份子藉機要求自由化，掀起反俄浪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格但斯克（Gdańsk）等地工人罷工，反對四十六種食品和日用品價格上漲，工潮危機，迫使戈慕卡下臺，吉瑞克（Edward Gierek）接任波共中央第一書記。但六年後，在一九七六年這一次的罷工事件中，由於波共血腥鎮壓，濫殺無辜，波人深表不滿，種下「團結工會」爾後揭竿而起的誘因。是年，一羣大學教授和人權活動份子，如著名的社會經濟學家李彬斯基（Edward Lipinski），激進的青年學者庫隆（Jacek Kuron），米契尼克（Adam Michnik）等人，挺身而出，為保衛社會正義與工人權益請命，暗中成立「社會保衛委員會」（KOR, The Social Self-Defence Committee），從事對因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而遭迫害者提供救濟，並予精神上的鼓勵，以及推動人權保護運動。一九八〇年八月，波蘭工人又對波共政權無法擺脫經濟困境感到不耐，再度爆發工潮。工人因得力於「社會保衛委員會」多年的苦心經營，工人運動的組織和策略愈漸成熟，終於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大罷工中以「團結」相號召，立即匯集全國工人力量，而正式成立共黨世界第一個非官方的獨立自主工會。①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波蘭前途的轉折時刻，風起雲湧，高潮迭起，曾創下東歐共黨國家多項先例。諸如：一九八〇年十月，容許第一個非官方的獨立「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一年後，因「團結工會」聲勢浩大，向波共政權挑戰，已威脅到其統治權力，華沙當局乃頒佈「軍管法」，實行軍事統治，鎮壓「團結工會」的活動，隨即取締「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七月，波蘭宣佈解除戒嚴，「團結工會」死灰復燃，轉入地下活動，對波共政權依然構成威脅；一九八四年七月，波共爲了緩和國內緊張情勢，乃經由議會的決議，宣佈大赦，釋放六百五十二名政治犯。惟在同年十月，「團結工會」顧問波比耶烏斯科（Jerzy Podjasko）神父遭內政部特務殺害，引起軒然大波，國內緊張情勢再度升高；一九八六年六月，波共召開「十大」，爲了因應戈巴契夫的「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政策，波共通過了黨綱，提出了波蘭未來發展的戰略方向，並在國務委員會主席下設立「磋商委員會」，網羅全國反對派著名人士參加，試圖加強朝野溝通，以示和解；④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波共提出政經改革方案，訴諸公民表決，雖然遭「團結工會」抵制，未獲通過，但却首創東歐國家全民政治參與的記錄；其後，在一九八八年經過二次的罷工浪潮，「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Lech Wałęsa）從中斡旋，有效地緩和波蘭境內的緊張情勢。波共當局終於同意與「團結工會」代表舉行圓桌會議，共商國家大事。從此，「團結工會」敗部復活，終於在今（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又正式成爲合法組織。⑤

從上述波蘭政局的演變看來，波共政權之所以進行大刀濶斧的政治改革，其主要理由乃基於下列因素的考量：

（一）經濟因素：社會主義體制最大的致命傷，就是中央指令性經濟，忽視市場的供需機能。七十年代以來，波蘭境內的動亂，幾乎都是導因於經濟問題。政府每次宣佈提高某些民生必需品價格時，工人均因無法忍受通貨膨脹的衝擊，不得不以罷工爲手段，要求收回成命，或要求加薪。如此惡性循環，導致波蘭的經濟每下愈況。目前，圍繞在波蘭經濟的三大難題：其一，外債，由一九八〇年的二百五十億美元，直線上升到現在的三百九十五億美元，光是每年要償還的本金和利息高達三十億美元以上，以其外貿的收入都無法應付。⑥其二，通貨膨脹，八十年代前五年，通貨膨脹均維持在二十至三十個百分點。最近二年直逼三位數，加薪的幅度遠不及通貨膨脹的比例，人民怨聲載道，對共黨政權已失去信心。⑦其三，工作效率低落，由於生活品質下降，工人平均每月所得只有一百七十美元，其工作士氣與效率，自然大打折扣，無法與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講究效率和利潤相比擬。波蘭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如不徹底進行改革，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勢必更加艱難。

註④ George Kolankiewicz/Paul G. Lewis, *Poland-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86), p. 95.

註⑤ *Der Spiegel*, Nr. 15/89, pp. 162-164.

註⑥ *Ibid.*, p. 164.

註⑦ *Ibid.*

(二)政治因素：基本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是互為因果，密不可分。波蘭的經濟狀況之所以惡化，其癥結所在，還是在於共黨政權官僚體制的僵化，整個行政系統金字塔式，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共黨政治局），尤其吉瑞克當權時代，大舉借債，特權橫行，假公濟私，貪污腐敗，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問題，却束手無措，表現無能。⑥再者，當「團結工會」崛起時，波共面對這股強大反對力量，儘管動用武力予以平息，但依然解決不了問題，朝野雙方的對立仍舊呈現緊張。因此，波共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已深切體認，必須在這樣的先決條件下：第一、收攬民心，「和為貴」，建立「和解」的共識。第二、放棄獨攬大權，接納反對勢力，共同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共赴國難；進行政治改革，始能挽救波蘭危機。

(三)社會因素：波蘭人民約有百分之九十信仰天主教，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揭棄無神論，與天主教神學相互對立。因此，儘管共產黨曾想盡辦法，消滅宗教，用種種手段予以迫害，但戰後教會對波蘭社會的影響力，依然有增無減，絲毫沒有衰退。當波蘭淪入鐵幕之後，波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迫害異己，蔑視人權，天主教會則挺身而出，經常扮演保護者的角色，伸張社會正義，有時候又充當中介者，巧妙地化解解尖銳的社會衝突，以維持某種程度的安定。一九七八年十月，克拉考(Krakau)教區總主教伍迪拉(Karol Wojtyla)膺選為羅馬天主教教宗，這是四百多年來（自一五二三年），第一位非義大利籍的天主教精神領袖，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波蘭籍教宗，這對波蘭人來說，算是最高的光榮。當一九七九年六月，這位取名若望保祿二世(Johannes Paul II)的波蘭籍教宗，在他加冕後首度回國訪問時，曾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其所到之處，人潮洶湧，歌聲嘹亮，振奮人心，似乎喚醒了波蘭人的尊嚴，「要做一個可以獨立自主的人！」這種自發性的羣衆動員盛況，就是擅長組織動員的共產黨，都覺得大開眼界，自嘆弗如。次年「團結工會」崛起，隨即獲得官方的承認，這與教宗的「祖國旋風」，實有直接影響。此後，一九八三年七月和一九八七年七月，教宗又再度返回祖國，從中斡旋朝野雙方的緊張對峙，其苦口婆心，精神感召，對波共和「團結工會」爾後的相互容忍，終於走上談判桌上，也起了積極作用。

(四)國際因素：波蘭的政治改革除了以上三項內在因素外，外在環境的因素也是至關重要。戰後，波蘭的政治發展一直脫離不了蘇聯的制約，其內政外交都追隨莫斯科的既定政策，獨立自主的空間極為有限。到了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華沙當局的自主性才有明顯的改變。由於戈氏大力推動改革，強調「公開性」原則，認為一切問題應予透明化，不必迴避。因此，波蘭的政經改革，顯然得到了莫斯科的鼓舞，其中最值得說明這項事實者，有下列三點可資佐證：其一，戈巴契夫一再重申的「新思維」，肯定社會主義建設可以多樣性，不再堅持所謂「共同規律」，並且還公開表明，「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其二，最近二年來，蘇、波兩國領導人的高峰會晤，戈氏曾坦率告訴雅魯澤爾斯基，祇要能夠拯救波蘭

的危機，任何方法，莫斯科都樂觀其成，不加干預。①這位蘇聯領袖甚至還表示，蘇、波兩國關係所留下的歷史空白，應予客觀重新評價，不再是「敏感的禁區」。其三，戈氏在蘇聯推行「新政」，一方面要言行一致，不能有雙重標準而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蘇聯內部也產生極大變化，已窮於應付，無暇他顧。同時，蘇聯也面臨經濟困境，無餘力協助波蘭解決經濟危機，華沙當局必須自求多福。

三、波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可是共產黨國家的憲法只是一種裝飾品，共產黨從不把它當作莊嚴神聖的法典，黨意高於一切。也正因為它是裝飾品，所以可以隨時修修補補。波蘭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議會正式通過「波蘭人民共和國」憲法迄今，至少已經修正過十四次。②初看起來，好像波共政權頗有彈性，能夠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化而修憲。其實，波共只是換湯不換藥，沒有把它當做一項嚴肅的大事，均未充分公開討論，反映民意。本來，波蘭在歷史上擁有值得驕傲的寶貴資產，早在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蘭即誕生第一部歐洲的成文憲法，這一天直到現在仍然被波蘭人視為重要的紀念日。過去一些年，波蘭人就經常假借這個「憲法誕生日」之名，舉行集會，藉以進行反政府示威之實，反對「一黨專政」。

戰後，波蘭歷經多次的動亂，國力日衰，波蘭人基於歷史上四度遭瓜分的慘痛教訓，加上八十年代經濟情勢日益惡化，舉國上下乃有危機意識，而逐漸建立共識。波共政權已深切體認到，鎮壓「團結工會」，排除異己，並無助於解決當前波蘭的內部危機。因此，如果不能與反對派和解妥協，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機器的崩潰。同樣地，「團結工會」亦認識到，波蘭正面臨經濟破產邊緣，如果一味訴之罷工行動，更會使整個波蘭社會癱瘓，人民利益和國家均蒙受其害。在這樣的主客觀環境下，由波共、「團結工會」、各黨派、教會、建設性反對派，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組成的五十七名代表，乃於二月六日開始舉行一連串的圓桌會議，就政治、經濟和「團結工會」合法化等三大主題進行討論，其中再區分集會結社、新聞媒體、環境保護等十二個小組，研擬具體改革措施，經過八週的艱辛談判，始克服彼此間的歧見而達成協議。③

根據圓桌會議討論的主題，朝野終於在四月五日簽署了「關於政治改革問題協議」、「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以及體制改

① George Kolankiewicz, *op. cit.*, p. 176.

② *Der Spiegel*, Nr. 22/89, pp. 165-169.

③ *Der Spiegel*, Nr. 15/89, pp. 162-164.

革問題的立場」和「關於工會多元化問題的立場」等協議。^⑭為了實現圓桌會議所達成的協議，波蘭議會（Sejm）隨即在四月七日召開會議，對憲法作了重大修訂，並通過了「眾議院選舉法」、「參議院選舉法」、「結社法」、「工會法修正案」和「個體農民農會法」。^⑮這些立法使波蘭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而打開波蘭民主化的契機，成就其重要改革內容分述如下：

(一)實行總統制：波蘭原設「國務委員會」，係議會常設的機構，其主席即國家元首，通常由波共中央第一書記兼任。修改後的憲法，取消「國務委員會」，改設總統，由議會兩院聯席會議（又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六年，得連任一次。總統代表國家，監督憲法的實施，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擁有解散議會、頒布法令、決定公民投票和宣布戒嚴等權利。

(二)增設參議院：波蘭的議會原採一院制，現在改為參、衆二院制。參議院負責審議眾議院通過的除預算案之外的所有法律案，然後向眾議院提出修改或撤消的建議；而眾議院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在至少有半數議員出席的情況下，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拒絕接受參議院的建議。參議院共有一百名議員，每省選出兩名，全部開放自由競選。^⑯

(三)眾議院議員席次按黨派比例選舉產生：眾議院四百六十個席位中，各黨派的比例分配為統一工人黨三八%、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二二%、親波共的天主教會愛國教會五%，另外三五%讓給反對派自由提名競選。換言之，波共和其傳統的聯盟組織，在議會可以控制六五%，其餘三五%由「團結工會」擁有。^⑰

(四)工會多元化：修改一九八二年制定的工會法，允許各種工會存在，實行有條件的工會多元化，改變過去只能有一個工會的政策。新修訂的工會法規定一九八二年被取締的「團結工會」和「團結農會」，根據工會法修正案重新登記後取得合法地位。^⑱

具體言之，波蘭朝野雙方共商的民主化改革措施具有下列特色：

第一，相當程度仿效法國，如法國式的總統制，總統擁有相當大的權力，選舉方式亦類似，以兩回合決定勝負，如在第

⑭ Ibid.

⑮ Ibid.

⑯ Ibid.

⑰ Ibid.

⑱ Ibid.

⑲ Der Spiegel, Nr. 25/88, pp. 124-125.

X

一同合併選人未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選票者，由二位最高票者再角逐第二回合，然後以選最高票當選。波蘭和法國在歷史上有共患難之交，波人對法國文化亦羨慕有加，其模仿法國的制度是可以預想得到的。

第二，波共放棄權力壟斷，接受政治和社會多元化的事實。過去，波蘭的選舉均由波共一手包辦，提出統一名單，同額競選徒具形式。在傳播媒體方面，允許「團結工會」辦一份日報和週刊，電視專有節目每週得使用半小時，電臺則為一小時，同時，新聞檢查也予以放寬，而加速了波蘭民主化的進展。

第三，擴大政治參與，允許人民有集會、結社和遊行的權利。過去，波共一元領導，蔑視人民的基本權利。現在社會多元化之後，可避免以前屢見不鮮的社會衝突，結束了長期以來，對「團結工會」是否合法化和如何合法化的激烈爭論，從而有利於公共生活的民主化。波共為表示改革誠意，在軍管法實施期間，被解職的五萬餘「團結工會」激進份子，重新雇用，政治犯也給予復權。

波共要由「一黨專政」轉向多黨民主，千頭萬緒，涉及層面甚多，一時之間要把整個政治體制徹底變革，實非易事。波蘭除了上述的具體改革措施外，朝野雙方對「繼續實行政治改革」、提出改善市場供應和人民生活條件、控制通貨膨脹、實施社會保險、建立新經濟秩序、克服外債負擔等方面已建立共識。惟在職工薪資保障、幹部改革政策、最高法院法官在任職期間不得參加黨派活動、青少年組織多元化、以及對經濟改革實行社會監督等問題尚有分歧，有待妥協。

不過，波蘭政治改革仍然存在某些障礙：首先，波共長期壟斷權力，根深蒂固，不會甘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況且，其所控制的政治系統遍及全國，難有一套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對地方自治和各事業單位的民主化，勢必產生阻力，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其次，軍隊國家化問題，以往共黨政權均採「黨政軍一體化領導」，軍隊由黨指揮。因此，波蘭在民主化進程中，如何使軍隊國家化，保持中立而不介入黨爭，也是相當棘手的難題。

此外，司法系統的改造，亦刻不容緩。如果司法不能從共黨的體系中獨立出來，政治再如何改革，其民主化的發展畢竟是有限的。匈牙利的政治體制改革，已能兼顧司法獨立的必要性，增設憲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對民主政治的運作，具有積極導正作用。

四、波蘭民主化的具體表徵

如果說圓桌會議是波蘭民主化的轉折，那麼波蘭出現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則是民主化的具體表徵。由四月



五日圓桌會議達成協議，至八月二十四日，戰後第一位「非共」總理產生為止，短短四個月當中，波蘭情勢的發展，可謂變化多端。令人難以想像，整個過程不但充分暴露一個共黨政權搖搖欲墜，喪失民心的局面，而且也說明了民主潮流不可逆轉，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已在華沙誕生，而展現予人耳目一新的面貌。茲就這種民主化發展過程，及其顯示的意義，略述如下：

(一)國會大選：波蘭於六月四日舉行大選，這是波蘭戰後四十餘年來首次自由選舉。根據波蘭官方公佈的選舉結果，參眾兩院共五百六十席（參院一百席、眾院四百六十席）中，只有二百五十七席符合百分之五十得票率的當選標準，另外三百零三席，必須在六月十八日第二回合選舉決定勝負（參見附表）。在本次自由選舉中，波共慘敗，波共和其聯盟在眾院所提名的二百九十九席（其中卅五席保留給政府高級官員，同額競選）名單中，只有五名達到當選標準，其餘均需再度參加第二回合的角逐，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保留給政府高級官員的卅五席同額競選的選區中，只有二名獲得二分之一的選票而告當選，其餘均未達當選標準。這些人包括部長會議主席拉可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內政部長季斯拉克、議會議長馬利諾夫斯基（Roman Malinowski），以及官方工會領袖米奧多維奇（Alfred Miodowicz）等人。④這種出乎意料的選舉結果，一度引起憲法危機，因為有三十三名政府高級官員在第一回合同額競選中都無法上榜，可能導致議院席次明顯缺額，非但沒有實現圓桌會議所達成的比例規定，而且也影

波蘭國會大選結果

類別	選舉		當選席次		各政黨在眾議院席次				
	第一回合 六月四日	第二回合 六月十八日	眾議院	參議院	統一工人黨	團結工會	統一農民黨	民主黨	愛國教會
投票日期	六月四日	六月十八日							
投票率	62.11%	25.31%							
合計	165	295	460	100	173	161	76	27	23

響國會議事運作。後來，波共和「團結工會」達成妥協，同意修改選舉法，始克服這場極為尷尬的憲法危機。反觀，「團結工會」在這次的選舉中則大獲全勝，在衆院所分配到的二百六十一席，當選了二百六十席，只有一席要在第二回合決定。而在參議院一百個席次中，「團結工會」囊括九十二席。在第二回合中又贏得七席，使「團結工會」在參議院一百席中控制九十九席的絕對優勢。（參見附表）^②

本次大選，「團結工會」以「公民團結論壇」的面貌號召選民，獲得驚人的成就。其意義有二：第一，「團結工會」獲得廣大選民的支持，其精挑細選的候選人平均得票率達七十個百分點，對波共民主化進程，將大有助益。^③第二，「團結工會」控制參院，可以牽制擁有立法權的衆院，今後波共有關法案，無法專斷獨行，必須和「團結工會」妥協，否則衆院的立法，將遭到參院的否決。「團結工會」之所以在這次大選致勝，有下列主要因素：其一，選民求變心理，寄予厚望；其二，擁有合法的傳播媒體（日報、週刊），可以宣揚自己的政綱；其三，競選策略成功，如強調民主化可以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援，協助波蘭政府渡過經濟難關，表現其務實與穩健作風，其所動員的選監小組，迫使波共不敢作弊。另外，波共當局的改革決心，也給「團結工會」一個良機，如魚得水，走向勝利之路。相反地，波共慘敗的因素：其一，波共無法挽救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其二，長期統治，乏善可陳，喪失民心；其三，波共大意失「荊州」，改革派和保守派明爭暗鬥，黨內失和。

如上所述，這次波蘭的國會大選，從整個過程看來，雖然沒有完全開放所有議會席次，讓各政黨公平競爭，還談不上是百分之百的自由選舉。不過，過程理性、和平，對一個長期壟斷權力的共黨政權來說，這種民主化的步伐，已相當快速地向前進，至為難得。

（二）總統選舉：過去，波蘭的國家元首，即「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務委員會」乃是議會的常設機構，類似蘇聯先前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目前的「最高蘇維埃」。由於議會一直控制在波共的手裏，如上屆議會席次：統一工人黨二四五席、統一農民黨一〇六席、民主黨三五席、其他獨立人士和教會團體七四席，波共在議會四百六十席次中，控制絕對多數。因此，過去波蘭的國家元首循例均由波共領袖兼任，輕而易舉，不必有任何顧慮。可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之後的總統選舉，波共可不再佔便宜了。因為，總統由國會兩院聯席會議選舉產生，波共已在議會喪失絕對優勢。波共和其傳統聯盟在參衆兩院聯席會議中，僅能控制五四%（統一工人黨三一%、統一農民黨、民主黨和愛國教會二三%共三百席），而「團結工會」則有四六%（共二百六十席）。在這種情況下，雅魯澤爾斯基深感當選無把握，乃於六月三十日宣佈退出競選，改推薦現

註① 同註①。

註② 同註①。

任內政部長季斯札克。因季氏與「團結工會」進行過八週的圓桌會議，開明形象較能取得「團結工會」的支持。惟雅、季二氏均有鎮壓「團結工會」的不良記錄，這種角色更替沒有任何意義，還是得不到「團結工會」的諒解。但二週以後，波共領導層經過慎重的考量，仍認為雅魯澤爾斯基是總統最佳人選，他已在國際上重新建立良好的形象，其改革政策並獲肯定。因此，由雅氏來領導波蘭最為適當。

總統選舉日期原訂七月六日，因美國總統布希七月九日訪問華沙，又臨時推延至七月十九日。波共中央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為唯一候選人，選舉結果：贊成票二七〇票、反對票二二三票、棄權三四票、廢票七票、缺席十六人。選舉方式，採有效票絕對多數計算，雅氏僅以一票之多符合當選的標準。從雅氏的得票情形觀之，波共和其聯盟，至少有三十張票藉故反對。這顯示，波共內部保守派可能不滿這種新國會改革，把這次波共選舉中慘敗歸咎於雅氏。而「團結工會」擁有的二百六十席中，只有二百三十三席投反對票，這顯示，「團結工會」所屬的議員，有人投贊成票，或藉棄權、缺席的策略，讓雅氏可以勉強過關，而不致於落選。雅魯澤爾斯基由宣佈競選總統，繼而聲明退出，最後又「披掛上陣」，出馬角逐總統。其過程表露二種意義：第一，雅氏仍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是目前波蘭不可少的穩定力量。第二，雅氏深得蘇聯和東歐國家領袖的信任，密特朗、布希先後訪問華沙，也提高了他的聲望。再者，在選舉之前，華沙正式宣佈，與羅馬教廷建交，成為第一個與教廷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東歐國家。波共與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可軟化「團結工會」的強硬態度，有助於朝野的妥協。因此，「團結工會」顧全大局，宣佈成員可以自由投票，沒有進行杯葛。

(三)「非共」政府的誕生：把波蘭民主化進程帶到另一個高潮，莫過於組織新內閣的戲劇性過程。雅魯澤爾斯基當選總統後，為了符合政治改革「黨政分立」的精神，乃辭去波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位。其遺缺改由部長會議主席拉克夫斯基接任，而新的總理人選，雅魯澤爾斯基提名原任內政部長季斯札克。季氏於八月二日經眾議院行使同意權，以二百三十七票絕對多數票通過（反對票一百七十三票，棄權十票，缺席四十人）。這位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參與鎮壓「團結工會」的新總理，曾一再試圖組織一個聯合內閣，網羅所有黨派。用共黨慣用的術語，「大團結，形勢看好」，「多黨合作」，但遭「團結工會」拒絕。根據波蘭新修訂的憲法規定，新總理要在二週內提出內閣名單，送眾議院審議同意。可是，季斯札克組閣任務，却告失敗。其無法組閣成功的主要因素：其一，「團結工會」拒絕參加新政府。其二，從季氏在眾院所獲同意票觀之，雖然他得票數比當選標準二百一十一票略多出二十六票，照理說，波共本來可以控制二百九十九票，這顯示其傳統衛星聯盟——

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沒有全力支持，甚至波共內部也有人投票反對，季氏已無法掌握全局。其三，既使季斯札克組閣成功，他在總理任內推動重大政策，「團結工會」可在參院抵制，迫使他的政策窒礙難行。正因為這些理由，導致季氏知難而退，宣佈放棄組閣內閣的艱巨任務。

當波共在失去組閣能力時，仍不甘心放棄權力，以更換「主角」的方式，由其傳統的尾巴黨——統一農民黨魁馬林諾夫斯基出面組閣，或許可以扭轉危機。不過，這種辦法也沒有得到「團結工會」的支持。此時此際，「團結工會」裏一位深藏不露的顧問卡士新斯基（J. Kasinski）早在七月，在極機密的情況下，與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的領袖展開接觸，商討相互合作的可行性。會談結果，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欣然接受，他們似乎已覺悟到，再不利用這種機會，修正他們過去做為波共「應聲蟲」的角色，將在羣衆中徹底喪失信譽。當卡士新斯基把這種信息告知瓦文薩之後，瓦氏不以為然，認為執政的時機還未成熟，應扮演反對黨的角色，仍應把這個爛攤子，讓波共去負責。後來，瓦文薩和「團結工會」的核心人物再仔細研商，才決定進行部署，並頻頻與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洽談。卡士新斯基這位謀略家，一方面向蘇聯駐華沙大使簡報「團結工會」組閣計畫，打聽莫斯科的態度，得知蘇聯不會干預；另一方面向西方發佈新聞，傳出「團結工會」未來的組閣腹案，擬由波共繼續掌握內政和國防兩部，以示波蘭仍一本過去對國際義務的承諾。於此同時，卡士新斯基打電話給雅魯澤爾斯基總統，要求會面，雅氏同意後，「團結工會」乃正式推薦馬佐維耶茨基·庫隆（Jacek Kuron）和格雷梅克（B. Geremek）等三名總理候選人。◎本來瓦文薩也有意出任，經過慎重的考量，「團結工會」認為瓦文薩是最後一張王牌，以「帷幄運籌」繼續領導工運為宜。這三人入選，庫隆是激進的人權活動份子，曾數度入獄，格雷梅克有猶太人血統，個性強硬，在波蘭還多少存在著反猶大傾向。為此，庫、格兩人僅是陪榜而已。瓦文薩之所以推薦馬佐維耶茨基的理由：第一，他屬溫和派，作風穩健，有擔任國會議員（一九六一—一九六八年）的經歷。第二，與天主教會關係密切，曾任教會和「團結工會」刊物的主編。第三，長期參與「團結工會」的活動，是瓦文薩的重要智囊之一。當時，雅魯澤爾斯基總統已無選擇餘地，只好順應情勢的發展。因為他要是接受「團結工會」的組閣要求，就得宣佈重新舉行大選；而且，如果又舉行選舉，波共可能再度重挫，不容冒險。所以，雅氏乃於八月十八日提名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並在八月廿四日提請衆院行使同意權。結果馬氏以三百七十八票壓倒性多數當選，其中僅四人投反對票，四十人棄權，三十七人缺席。這顯示，在波共一百七十三名議員中，有九十一人投贊成票，馬氏遠比季斯札克更受到支持。◎於是，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終告誕生。

註② Der Spiegel, Nr. 34/69, pp. 118-121.

註③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版。

這個「團結工會」主政的內閣，經過二星期的協商斡旋，始告定案，其主要閣席分配如下：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巴爾采羅維奇 (Leszek Balcerowicz)，團結工會

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季斯札克 (Czesław Kiszczak)，統一工人黨

副總理兼農業部長：雅尼茨基 (Czesław Janicki)，統一農民黨

副總理兼科技發展部長：亞諾夫斯基 (H. Janowski)，民主黨

外交部長：斯庫比謝夫斯基 (Krzysztof Skubiszewski)，無黨籍

國防部長：西維茨基 (Florian Siwicki)，統一工人黨

工業部長：瑟里亞切克 (Tadeusz Syryjczyk)，團結工會

勞工部長：庫隆 (Jacek Kuron)，團結工會

文化部長：齊溫斯卡 (Izabella Cywińska)，團結工會

社會問題部長：巴拉斯 (Artur Balasz)，團結工會

這份內閣名單於九月十二日正式獲得衆院同意（四百零二票贊成，十三票棄權，沒有反對票）。◎這個戰後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內閣成員，統一工人黨佔有內政、國防、運輸、對外貿易、中央計畫委員會等五個部會；統一農民黨擁有農業、司法、環保、衛生等四部；民主黨擁有商業、科技發展等三部；「團結工會」囊括財經、文化、廣播電視委員會等十一個部會。從馬佐維耶茨基的內閣看來，具有下列特色：

其一，年輕化：新內閣閣員年齡均在四、五十歲上下，如工業部長四十一歲，財政部長四十二歲，社會問題部長四十三歲。這顯示內閣充滿活力，予人有開創新局之感。

其二，專業化：在廿三名閣員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學有專精，如外交部長是知名的國際法教授，財經、司法、文化、農業、工業、環保等部首長亦都是一時之選的學者專家。

其三，兼顧各黨派利益：過去，波共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大權在握，獨斷獨行，其他黨派（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即使參與內閣，也僅是「花瓶」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新內閣則權力分享，「各取所需」，波共仍然控制內政和國防等要津。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這二個小黨，在內閣中已佔有七個部長席位，其權力比過去增加甚多。

「團結工會」原本擬訂一九九三年下一屆國會大選，做爲執政的目標，而本屆則以扮演反對黨的角色，俾吸取更多的經驗。未料，「團結工會」提早嚐到權力的滋味。顯然地，這個「非共」領導的新內閣，任重道遠，正面臨債臺高築，高通貨

五、結 論

綜合以上分析，波蘭的民主化發展，至少顯示下列三點意義：

第一，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局面已被打破。波共四十年來，長期的權力壟斷已喪失民心，其獨攬大權的統治地位，正式宣告結束。政治多元化的時代潮流已在東歐蔓延擴散，產生了「骨牌效應」。

第二，證明社會主義體制失敗。波蘭推行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其結果非但沒有提升波蘭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反而使波蘭的政經發展惡化。爲此，華沙當局不得不痛定思痛，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一方面改造現行政治體制，實行多黨民主；另一方面引進市場經濟機制，調整經濟結構，以挽救危機。

第三，以理性方法有效解決內部衝突。共產黨一向以「革命政黨」自居，自以爲負有歷史使命，不容許有反對勢力的存在。惟近期波蘭的民主化進程，朝野雙方均表現理性；波共放棄權力壟斷，勇於承認過去錯誤，並讓反對黨合法化和分享權力；同樣地，「團結工會」也能體認時艱，沒有爲「反對而反對到底」，攜手合作，共赴國難。波蘭朝野的理性態度，頗具有啓示作用。

不過，波蘭的民主化進程，目前尚有二項刻不容緩的課題，亟待克服；其一，經濟問題；其二，內政問題。前者，新政府面對高達三百九十五億美元的外債，和近百分之五百的高通貨膨脹率，即使西方國家伸出援手，熱心相助，但要湊足一百億美元救急並非易事。①誠然，波蘭「非共」政府要比原波共政權容易取得西方的信賴與援助，惟短期間內波蘭仍須忍受降低生活水平的痛苦，有計畫地調適經濟策略，逐步克服困局；後者，最主要關鍵在於波共本身。波共是否真心真意，放棄馬列主義教條，而轉換體質。由於波共長久統治，基層組織散佈全國，加上情治安全系統均在波共的控制之中，波共會不會誠心放棄這些特權，仍令人存疑。

基本上，波蘭的經濟問題，西方國家多少可以助一臂之力，但真正要治癒波蘭長久累積下來的沉痾，還得靠自己在三五年內，努力耕耘，自求多福。在內政問題上，波共似乎有轉向「中間偏左」的社會黨跡象。根據資料顯示，有百分之七十的波共黨員贊成更改黨名，走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這種轉變可望在明（一九九〇）年元月召開的「十一大」作最後決定。②看來，這二個問題並不是頂棘手。如果共黨政權在民主化過程中，成功地使政權和平轉移，那麼「波蘭經驗」的範例該是劃時代的歷史性創舉。

註① 1987.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版。